#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实践困境与应对

2013年《商标法》首次引入惩罚 性赔偿条款,2020年《民法典》第 1185 条规定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 一般性条款,与此同时,《专利法》 《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 全面引入惩罚性赔偿条款。至此,知识 产权惩罚性赔偿在立法体系上得到完 善,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成为关键。

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 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 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故意""情 节严重"认定以及"计算基数""倍 数"确定等核心问题作具体规定,为知 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落地提供明确指 引。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2024年 全国法院适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案件 达 460 起,同比增长 44.2%,其中汽车 底盘技术秘密侵权案判赔 6.4 亿元, 离 心压缩机技术秘密侵权案判赔 1.6 亿 元,彰显司法保护力度。

# 适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 制度的实践困境

尽管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框架 已初步完善, 但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 的适用仍面临以下困境:

#### 1 构成要件认定标准模糊

不同立法对主观要件标准规定不 《民法典》《专利法》《著作权 法》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是"故 意",而《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规定的主观要件"恶意"。从字面理解, "恶意"的主观过错程度明显高于"故 意",导致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主观 要件适用标准的不统一,对不同知识产 权类型案件的主观要件适用标准也不统

对"故意/恶意"主观要件的认定 不仅未能细化, 甚至可能泛化。故意是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排除了非 故意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的可能, 体现了惩治严重侵权行 为的立法目的。但是,由于立法并未规 定故意认定的标准和情形,司法实践中 各地法院的认定标准不一。为此,"司 法解释"规定了"故意"认定的考量因 素,并列出了初步认定故意的情形。该 规定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和统一各地法 院对故意的认定,但依然未能细化具体 情形, 对重复侵权、间接故意侵权等未 能明确为故意,甚至不做区分地认为 "实施盗版、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均为 故意, 泛化了故意认定。

此外, "情节严重"的客观要件认 定标准模糊。情节严重是适用惩罚性赔 偿的又一必要要件, 但是, 立法上并未 规定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和具体情形。 这就导致法官在个案认定中的自由裁量 空间过大。为此,"司法解释"规定了 情节严重认定的考量因素,并列出了可 以认定的情形,但仍难以全面列举。

#### 2.赔偿基数确定困难

惩罚性赔偿以赔偿基数和惩罚倍数 作为计算依据,否则就无法真正发挥震 慑严重侵权行为人的法律效果。

我国知识产权单行法均具体规定了

- □ 尽管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框架在立法上已初步完善,但司法实践中惩 罚性赔偿的适用仍面临构成要件认定标准模糊、赔偿基数确定困难、惩罚 倍数确定规则缺乏等困境。
- □ 完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首先要明晰其适用的主客观要件,在立法 上统一主观要件为"故意"。司法适用中,"故意"应扩大理解为包含"间接故 意",同等适用惩罚性赔偿符合惩治严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立法目的。
- □ 建议优化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确定方案,进一步完善许可使用费作为赔偿基 数的顺序和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增加"约定赔偿"作为惩罚性赔偿的 基数,并适用举证妨碍规则,增加"推定赔偿"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

可以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实际获 利、权利许可使用费三种计算方式确定 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但实际损失、 侵权获利、许可使用费的数额确定本身 就存在举证难、计算难等障碍, 在知识 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引入后,赔偿基数 的计算难问题并未迎刃而解, 反而成为 惩罚性赔偿适用的"拦路虎"。虽然为 了确定赔偿基数,司法解释已经从变通 确定计算方法、引入举证责任倒置等途 径做出努力, 但在司法实践中, 还存在

一是可作为赔偿基数的三种计算方 法适用率低。在补偿性侵权损害赔偿情 形下,以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侵权 获利、权利许可使用费倍数确定损害赔 偿数额本就存在重重障碍和困难,因为 计算参数难获取、技术分摊难等问题, 作为兜底的法定赔偿就成为主要的赔偿 方式,此司法症结已饱受各界诟病。

二是许可使用费作为赔偿基数受适 用顺序和计算方法的限制。我国知识产 权单行法规定, 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 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时才可以 适用权利许可使用费,限制了权利人自 主选择赔偿基数确定方式的可能。另 外,对许可使用费的确定方法,大多局 限于已有在先许可的情形, 但是实践中 权利人往往未曾对外许可, 使得许可使 用费被实际虚置。

### 3.惩罚倍数确定规则缺乏

关于惩罚倍数, 我国知识产权单行 法均规定了一倍至五倍的法定适用区 间。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惩罚倍 数可为非整数倍。

"司法解释"规定,应当综合考虑 被告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情节严 重程度等因素确定惩罚倍数, 该规定较 为简单笼统。对于如何在一倍至五倍间 认定惩罚倍数,所谓的"不同程度"如 何对应具体惩罚倍数的认定规则也并不 清晰。因此,司法实践中惩罚倍数的确 定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导致同案 不同判、倍数确定的说理不充分、 庸化"处理确定 2-3 倍, 甚至以诉请 赔偿数额倒推倍数等问题。由于非整数 倍的认定相较整数倍更加精细,因此, 在惩罚倍数的整数倍确定规则尚且模糊 的情况下,惩罚倍数小数值精细化的确 定障碍更大。

同时,惩罚倍数的调整因素忽略了 公共利益的考量。"司法解释"规定了 公权力的处罚情况可作为惩罚倍数的调 整因素。知识产权案件类型具有复杂 性,但目前惩罚倍数的调整因素较为单 一,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以及知 识产权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双重属 性,惩罚倍数认定的调整因素有待进一 步考量。

## 完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 制度的几点建议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 作的意见》近日公布,其中提到要"完 善在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产品缺 陷、环境污染等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 度"。针对上述困境,知识产权惩罚性 赔偿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要明晰惩罚性赔偿适用的主 客观要件,在立法上统一主观要件为 "故意"。尽管《司法解释》已明确"故 为主观要件,但是现行立法中"故 意""恶意"并存,必然导致司法适用 的不一致。理论上,《民法典》已明确 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是"故意", 作为下位法的《商标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依然规定主观要件为"恶意", 已形成了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 理应 作出修改,统一为"故意"主观要件, 以确保法律规定的统一性和体系性。

司法适用中,"故意"应扩大理解 为包含"间接故意"。无论是积极追求 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故意,还是放任损 害后果发生的间接故意,都是有别于过 失的主观状态,两种故意具有同等的法 律可责性,同等适用惩罚性赔偿符合惩 治严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立法目的, 也有利于法官对故意主观要件的认定。

在进一步细化故意和情节严重的情 形时, 需要明确区分认定主观要件与客 观要件。故意认定是对侵权人主观意志 的判断,情节严重认定是对侵权行为的 实施、后果和影响的判断。故意与情节 严重相辅相成、相互关联。法官应全面 审查、分别认定,不可依据一个要件推 定另一个要件。对故意和情节严重的认 定应以"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为基 础, 但不可拘泥于规定, 对于达到与规 定相似严重程度的情形, 也应作出认

其次, 应优化惩罚性赔偿的基数确 定方案。对于许可使用费作为赔偿基数 的顺序和计算方法,应进一步完善。取 消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 所得难以计算的才可以适用权利许可使

用费的适用顺序,将三种确定方式并 列,赋予权利人自主选择的权利,将更 有利于权利人对赔偿基数的举证。对于 许可使用费的确定,可以变通确定合理 许可使用费,采用虚拟谈判法,从而提 高许可使用费方法确定赔偿基数的适用

在此基础上,建议增加"约定赔 偿"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并适用举 证妨碍规则,增加"推定赔偿"作为惩 罚性赔偿的基数。约定赔偿的性质是对 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的变通确定手段, 内容是对侵权损害赔偿的"一揽子约 定"。约定赔偿具有作为惩罚性赔偿基 数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司法实践中也已 有认定约定赔偿为赔偿基数的案例。

而为减轻权利人对赔偿额确定的举 证负担, 法律规定了举证妨碍规则。基 于举证妨碍规则, 在权利人已经尽了必 要举证责任, 若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 簿、资料等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 法院 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 若侵权人不提 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法院 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确 定赔偿数额。以此推定的赔偿数额,应 当可以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

最后,如何精细化确定惩罚性赔偿 的倍数?对此,应明确侵权主客观要素 和惩罚倍数的对应关系,细化侵权主客 观要素与惩罚倍数的对应规则。

司法实践中,对惩罚倍数的认定存 在模糊性、折中性、任意性的问题,需 要细化并完善惩罚倍数的认定规则。侵 权主客观要素和惩罚倍数的对应关系, 在整体上应呈正比例关系, 在具体对应 关系上,应对"高度概括性""充分量 化"的两种认定方案采取折中处理,保 留法官合理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兼顾司 法适用的统一性和灵活性。

在惩罚倍数的认定上,应区分主观 过错程度,以主观过错程度作为调整惩 罚倍数区间的标尺, 当客观侵权情节严 重程度相同时,对主观状态为间接故意 的行为人适用的惩罚倍数可酌减,以此 体现对主观过错程度的区分考量。

针对客观侵权情节既包含定性因素 又包含定量因素的特点,建议在裁量惩 罚倍数时区分考虑。可以对客观侵权情 节严重程度进行赋值,确定侵权客观要 素与惩罚倍数区间的对应关系,以优化 司法实践中惩罚倍数认定的规范性和可 操作性。在惩罚倍数区间确定的基础 上,根据不同知识产权的客体特征,进 一步精细化认定惩罚倍数的小数值。遵 循知识产权利益平衡原则, 还应考虑公 共利益因素作为惩罚倍数认定的调整因 素,以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倍 数认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作者系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 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济大学知 识产权学科委员会主任, 中国法学会知 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